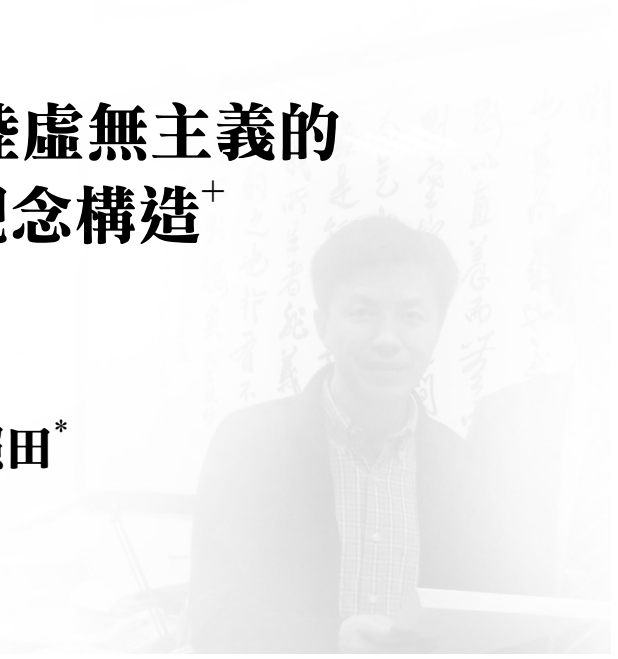


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 歷史與觀念構造⁺

賀照田^{*}



我對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問題的關心，源於我對如下現象的困惑：中國傳統上本是一個高度關注倫理的社會（梁漱溟便把中國社會、文化此種特點特別點出，稱為「倫理本位」），中國社會主義教育又是一種強理想主義教育，那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啟動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中國大陸社會在表現上卻變成日常生活極被商業邏輯穿透、日常語言和心態氛圍極受市場邏輯和消費主義籠罩和干擾的社會了呢？中國人向來被認為有很強的享受生活、承受苦難的能力（羅素當年來華便深驚異於中國人享受生活的能力，李澤厚更命名中國文化此種特質為「樂感文化」）的民族，為什麼在「新時期」短短的時間內，中國的自殺率卻如此高速攀升呢？還有就是新興宗教在上世紀九

十年代中國大陸飛速傳播現象所帶給我的困惑。

對這些明白有著重要性問題的再審視，使我更加確認歷史維度對理解、把握中國大陸和精神有關的現實的意義。因為上述精神現象在相當重要的層次都和它們所處身的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史機制密切有關。

那麼，如何才能有力地深進此歷史內在去理解、把握此精神史問題呢？經過幾年的閱讀和思考，我以為，要真正深進文革以後中國大陸精神史內在，必須首先細心面對毛澤東時代和其後精神史關聯上的複雜性。就是，在看到毛澤東時代歷史挫折直接帶給文革以後中國大陸精神狀態的巨大影響時，還必須同時看到，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面貌的基本面所以如我們

⁺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本院訪問學者學術交流會所發表之論文摘要。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所見形成，毛時代的直接影響外，還和文革結束後，無論是一般當事人，還是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意識和思考其時的精神史問題相關。也就是，文革後中國大陸精神史形成我們所見的那樣一種狀態並不是必然的，而是歷史和歷史中的我們的觀念狀態結合起來才產生出的結果。而也只有以這一對接下來精神史軌跡形成具根本位置的環節的澄清為背景，我們才可明瞭接下來諸多歷史事件和觀念嬗替所帶給此精神史的，為什麼會是如我們所見這樣一種歷史後果。

這麼說是因為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相當部分人群，特別是精神、人格形成關鍵期處於毛時代共產主義新人打造籠罩性氛圍的當時少年、文革結束後青年的一代中，一方面瀰漫著因狂熱而虛脫，因熱烈而冷漠，因狂信而虛無的精神狀態與心理；另一方面，與這種虛脫、冷漠、虛無相對，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雖然其先前高漲的理想主義精神亦受到此歷史挫折的強烈打擊，但卻沒有影響到他們認為人應該對歷史、對國家、民族、社會承擔責任，和認為人應該追求有明確意義感的生存方式這兩種精神取向所構成的理想主義內核。而相對於上述兩種情況，其時更普遍的是，在同一個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實的虛無情緒，否定一切價值的衝動，另一方面是同樣真實的理想主義衝動，對意義感的強烈渴望。而後者正是先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留給文革後的中國最寶貴的遺產之一。所以，當時如果能清醒意識此一方面虛無情緒、虛無心理蔓延，一方面理想主義衝動猶強的精神史局面，便應該一面考慮如何轉化此理想主義——使它在不放棄試圖為歷史、國家、民族、社會承擔責任並於此獲得意義感的精神動力內核的情況下，能夠把對大歷史、大政治課題的關懷，和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具體形式，並從中獲得具體充實感相結合；一面考慮如何轉化、吸收當時的

虛無心理虛無情緒——也即細緻考慮，把對大歷史、政治課題的關懷與把此關懷在日常生活、日常工作情境的意義植基，與克服個人在歷史挫折的遭際中所形成的生命意義感危機問題相結合。可以想見，當時若有這兩種意義的結合的自覺展開，中國大陸當代精神史的局面肯定會和我們實際所見的歷史局面不同。

令人遺憾的是，當時不僅國家，而且知識界都對這樣一種時代精神倫理狀況、時代精神倫理課題沒有足夠清楚的意識與思考，並且不僅當時沒有對這樣一種問題性質有深切認識，至今，對這一切仍然沒有深切、準確認識。而這，正是——中國大陸現下有關精神、信仰、價值、倫理的關懷和議論非常之多，卻因為這些關懷和議論沒有以對歷史的準確認識為前提，因此使得這些誠摯的呼籲和自認為負責任的宣導，自認為負責任的批判，實際上都有效性不足，乃至實際上文不對題——的關鍵原因所在。

所有這一切，思之讓人心痛、扼腕！